第13—15版
每周一出版 第483期
2008年7月7日

经济周刊

人民日报

过渡安置房为四川震区群众解决住房问题搭起了过渡之桥，请看本报记者深入灾区的独家调查——

走访过渡安置房

本报记者 王 炜



●安置房小区的新生活
有了安稳踏实的感觉

已经是盛夏。汶川地震一个多月来，绵阳难得有几天艳阳高照。在北京市援建的安县花荄镇过渡安置点“京安小区”，阳光照耀着337套蓝顶白墙的活动板房。板房每间20平方米，十间一排，之间相隔3米；五排成一个组团，相隔9米。小区里有一座学校和小卖部、警务室、医务所和露天电影放映场。

趁着天晴，妇女们抓紧时间洗衣服，晾晒在门前石子铺成的道路上。男人们在“招聘信息栏”前驻足，这里贴着福建、浙江、江苏等地20多家企业的招聘信息。事实上，已经有200多人通过这种招聘走出灾区，有的甚至带着全家出去寻找新生活。培训室里，几个年轻人正在学习装配电子元件，原本务农为生的他们将来要靠新学的手艺谋生。孩子们已经在板房学校里复课。由居民组成的治安巡逻组刚刚换班，开始新一轮巡逻；清洁卫生组在打扫垃圾和公共卫生间、淋浴间；防疫组在喷洒今天第一遍杀虫剂和消毒液，这样的工作每天要进行4次……

京安小区住着从受灾严重的茶坪乡安置来的1123位居民，他们是四川地震灾区最早入住安置房的受灾群众。“我觉得满足了。”一个多月来，78岁的茶坪乡居民张志成终于有了安稳踏实的感觉。

截至6月25日，四川地震灾区已建成过渡安置房30余万套，超额完成一期建设计划。根据建设进度和最新上报的安置需求，有关部门已决定将二、三期建设任务合并，并适当缩减安置住宅的数量，增加学校等配套设施的数量。

受灾群众正陆续从闷热潮湿的帐篷搬入活动板房。安顿以后，他们开始认真安排自己的新生活，这样的生活要持续3到5年。

●只有人等货，没有货等人
考验中创造奇迹

短短12天，都江堰市的一片120亩废墟上“生长出”一座有50余座平房、167间教室，厨房、操场、宿舍一应俱全的活动板房学校——皖川中心学校，这里容纳了地震前都江堰市6所学校共7000余名一度因灾失学的学生。

来自援建地安徽的某钢构企业工人商晓波和他500多个兄弟没日没夜地干了12天。“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没有电，现买3台发电机；路面不能开大车，靠人力一块一块往里搬运板子，只有人等货，没有货等人；克服不同队伍交叉作业的困难，24小时不停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以“不可能的速度”建起了这座学校。

3个月内建成100万套过渡安置房——平均每天1万套，来自全国23个援建省市的数万名建设者们在以“不可能的速度”奋战着。工地上尘土飞扬，挖掘机、重型卡车来回穿梭……

“太辛苦了……”看着学生们回到课堂，商晓波终于松了一口气。新的任务下午就会下达，他们将赶赴另一处过渡房建设场地。一期任务超额完成，建设者们根本无暇庆祝，等待他们的除了更艰巨的任务、糟糕的天气、缺水缺电缺油的处境，还有许多他们难以掌控的困难。

困难之一是缺地，最缺大面积的平地。

活动板房全部是平房，占地面积大，而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山区，加上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本来就稀缺的平地变得更加可贵。截至6月22日，阿坝州过渡安置房建设仅完成一期目标的16%，最大的制约因素便是“无地可用”。山东省援建的北川县擂鼓镇，1400平方公里土地可用于建设的仅0.3%，建设者硬是把高差近30米的一片废墟推平，才得以正式开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建设技术导则》提出，安置房每处集中建设规模不宜少于50套。现实是，为了节约土地，只要能建三四套的地方都被利用起来。再小的安置点也要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其背后是援建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困难之二是扶摇直上的原材料价格。安置房需求量一夜猛涨，原材料供应出现短缺，价格迅速上涨，而且采购十分困难，导致部分工地时不时地停工，影响了建设进度。四川省和各援建省市政府已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建材采购区域已从四川扩大到重庆、贵州等地。

●从分散到集中
全新的居住模式面临新问题

用四川省崇州市鸡冠乡党委书记吕刚的话来说，灾区群众搬进安置房，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去是分散居住，现在是集中居住，许多问题考验着社区新居民。

吕刚现在的身份已经是“鸡冠乡新区”管委会主任。他要带领17个人的团队为集中居住在62亩土地上的960户人家、2955人提供服务。这些家庭以前分散居住在45万多亩的土地上。吕刚有许多事情要办：乡里还有400多人在23公里以外的山上住帐篷，有的不愿意离开家乡；一批新的招工信息待会儿要通过广播发布出去；群众做饭的燃料问题还没有解决；14人的卫生保洁队伍今天必须建成……

集中居住在相对拥挤的空间里生活3到5年，这是一种全新的社区模式。就业、公共服务、卫生防疫、治安等社会问题很快将浮现出来。不同富裕程度、生活习惯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一起生活，文化和心理问题也需要密切关注。

可喜的是，人们担心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在设法解决。比方就业，一方面，有关部门积极组织沿海省份企业到灾区招聘工人，进行就业援助。另一方面，擦干眼泪的受灾群众在第一时间加入了过渡安置房的建设大军。据不完全统计，施工现场有近1/3的建设者是等待安置的当地群众，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参与重建，也为自己赚取灾后的第一份收入，以工代赈。

记者看到，每个安置房小区都设有学校、卫生所、警察室等公共设施，相关人员已经到位。设计者在小区规划时也尽量考虑群众的生活习惯，将原本来自同一地区的居民相对集中安置，各个小的安置点之间用绿化带、景观路等隔开。目前过渡安置房社区基本运转正常。

现在，吕刚和他的团队开始考虑更长远的事情。鸡冠乡重建规划很快就要公示，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解决。安置房拆除后如何再利用，建筑垃圾怎么处理？安置点占用了部分农田，四川省是城乡统筹的试点省份，能不能将失地农民的补偿与城乡统筹结合，直接完成这些土地的流转，将农民转变成市民……很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凸显，吕刚深感需要政策的指导和专业人士的支持。

左上图：6月29日，四川省崇州市三郎镇受灾群众喜悦地领到了过渡房钥匙，入住安置小区。 郝维平摄



本版责任编辑：杜海涛
电子信箱：jjzhoukan@yahoo.com.cn

经济热点



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谈农村灾后重建

适时调整重心 激励农民参与

本报记者 江 夏

观点

汶川“5·12”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一次特大地震。此次地震波及的地区多数是农村，涉及的人群大多为农民，造成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因此，灾区农村重建面临的任务极为艰巨。科学合理地选择农村灾后重建的思路非常重要。

■适时调整政策重心，实现由对农民的救济政策向发展政策转换

记者：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挽救生命，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住活动房屋、吃配给的食物毕竟非长久之计。田地山林毁了、自然景观毁了，原有的产业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灾区农民今后靠什么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

郭晓鸣：我认为，必须根据灾区下一步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政策重心，将以救济为主的援助政策调整为以扶持为主的发展政策。从当前现实出发，灾区重建应率先实施四个方面的发展政策。

一是“以工代赈”支持政策。在恢复重建灾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应当尽可能建立当地农民的参与机制，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吸纳农民对建设项目的具体意见，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政策，尽量让农民直接参与各项重建工程。使农民成为参与家园重建的主体，从灾后重建中获得经济收入，与恢复生产方面的努力共同形成灾区农民多渠道的收入来源。

二是就业支持政策。灾后重建中大规模建设资金的进入，必然意味着灾区将形成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灾区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就业适应能力不强，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持政策，通过加强定向定人的技能培训，全方位提供就业辅导，显著提高灾区农民就地就业的基本能力。

三是组织化支持政策。地震灾害对灾区许多农户家庭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灾后恢复生产中劳动力短缺矛盾将全面显现，为此特别需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类型的民间互助组织，强化对社区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农村传统的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依靠农村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来实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四是经济发展支持政策。灾后重建面临着许多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需要制定内容更广泛的发展支持政策，应根据灾区农民的现实境况，设立专门的建房、恢复生产等信用贷款，建立适应灾区现状的新的农业保险体系，以更大力度推进灾区农村土地和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在强化外部支持前提下，更多地启用市场化机制促进灾区农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本，高度重视构建农民的自主参与机制

记者：灾后重建不仅仅是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重建，不仅仅是大规模建设资金的集中投入，更面临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怎样充分调动农民参与重建的积极性？如何防止出现有意或无意损害农民利益的偏差？

郭晓鸣：一方面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推进农村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是重建农民自己的家园，应当以农民利益为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满足农民需求，高度重视构建农民的参与平台。灾区农民长期生活在当地社区，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清楚灾后安置重建所面临的优势和潜力、困难和劣势。因此，在安置重建中应当构建农民自主参与的内在机制，让农民能够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安置重建方式。农民是灾后安置重建的利益主体，充分保障其基本利益是灾后安置重建中头等重要的大事。灾后安置的过程，既是农民重建家园信心不断增强和参与灾后重建主动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又是广大农民的“民间智慧”能够充分汇集和各种现实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的过程。应当防止因农民被排斥而抑制其重建家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部分灾区农民可能产生的被动依赖的不利倾向。

另一方面应当实施以农村社区为重点的“整村推进”安置重建模式。农民历来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其特有的社区凝聚力是灾后安置重建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充分挖掘的重要精神资源。因此，灾后安置重建一般不应轻易打破已有的农村社区边界，要尽可能保有原有的资源利用格局，稳定原有的利益关系，保留农村社区内部低成本、高效率的沟通、协调、合作等功能。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构建农村社区在安置重建中的参与机制，倡导并支持社区主导型的灾后安置重建模式，应当运用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编制农村社区灾后重建规划，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当地社区和农民参与规划活动的全过程。应真正赋权于社区，将安置重建中建设项目的选择、实施、监管等重要权利交给社区，既通过充分调动社区自主参与的能动性实现保障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目标，又避免简单化大规模集中安置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六月三十日，在安徽淮北市一家自行车专卖店市民在选购自行车。随着油价上涨，安徽省淮北市自行车销售大幅升温，许多市民更多地选择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 王文钱勇摄影报道

马背上有多少钱

高云才

►►对马业任何过高的估计都会带来投资风险和投资损失，投资如何适度成为当务之急

对牧民胡鲁图来说，没有马，甚至就是没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在这个二十郎当岁的牧民眼里，马，甚至就是他的一切：襁褓中是阿爸背着在马背上放牧，孩提时在马背上同伙伴们嬉戏，成年后在那达慕上摔跤表演，是在马背上庆祝胜利……而对马背上有多少钱，胡鲁图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想法。

但在李云林看来，马背上都是钱。他是吉林的成名企业家，身价上亿，每天早上他都要骑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公马“腾云驾雾”一番。现在，他每年投入养马的费用就在1000万元以上，舍得。

在李云林看来，马就是宏伟的产业。因为，马是竞技，是精神上的慰藉，是文化，马的人文意义天生就可以延伸出产业，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千百年来，马业在牧民的呵护下代代相传，长盛不衰。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马业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不难发现，若将马业的企业家视野扩大，就能看到马业实际是投资新宠。据中国马业协会估算，我国在马术、赛马、骑乘、旅游、收藏等方面蕴藏产值达到千亿。马术俱乐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目前全国正规马术俱乐部达到200多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以及内蒙古、新疆等地的旅游城市。奥运会开幕在即，奥运马术比赛，将进一步推进马术和马业产业升温。

马业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比较成熟。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马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链，利润潜力巨大。可以在解决就业、拉动消费、推动农业特别是畜牧业发展上有精彩呈现。就畜牧业而言，马业兴旺，可以带动饲料业以及马具的生产；在推动畜牧业科技发展的同时，可大大提升畜牧业升值空间，甚至可以实现优良种马和赛马的出口。

看来，马背上可能有很多钱，有很大的钱。但是，也要看到，马背上的钱，并非唾手可得；马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要在传统马业基础上发掘现代马业的路径，赋予传统马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拓展。再是，品种的改良需要畜牧科技的极大付出，疾病预防是马业面临的重要科技攻关题目。三是对马业任何过高的估计都会带来投资风险和投资损失，因此投资如何适度成为当务之急。投资过量，不符合马业现状，会造成消化不良。据中牧集团资料，以初养马者养一匹最普通的英半血马来计算，购马费用达20万—30万元，每月饲料费用1000元以上，对投资者来说，不可不慎。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现代马业，无疑是一个新兴产业。政府及时研判，及早出台相关管理政策，不使现代马业管理处于真空状态，因势利导，既防范风险，又使产业获得稳步推进、良性发展，已经成为必然。

经济茶座